

# 馬禮遜：中國基督教開山事業的締造者

譚樹林\*

1807年，英國倫敦傳教會派遣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牧師到中國傳教，標誌着基督教新教正式在華傳播的開始。<sup>(1)</sup>所謂“開山時期”，是指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大約最初的五十年”，馬禮遜被視為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傳播的“開山始祖”。<sup>(2)</sup>不僅如此，筆者認為，馬禮遜同時也是中國基督教新教開山事業的締造者，他佔據着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的多個“第一”：馬禮遜是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翻譯出版中國第一本聖經中文全譯本；建立了第一所新教教會學校——英華書院；施洗了中國第一位新教基督徒蔡高；按立了中國第一位牧師梁發；編纂了第一部中英辭典——《華英字典》；創辦了第一份中文月刊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等等。所以，我們說馬禮遜是中國基督教（新教）開山事業的締造者，確是當之無愧的。

## 中國第一本聖經中文全譯本

聖經中文全譯本的出版是近代基督教傳教事業一大成功的標誌，“而這最大的榮譽則歸給馬禮遜”<sup>(3)</sup>。

實際上，基督教自唐代（時稱景教）傳入中土起，就開始了聖經漢譯的過程。歷來研究中文聖經翻譯史的學者，一般把聖經的譯本分為三個類別，“第一種是景教的譯本；第二種是天主教的譯本；第三種是基督教的譯本。”<sup>(4)</sup>“景教的譯本”就是指唐代的景教譯本，依據就是1625年左右在西安府崇仁寺附近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上刻“真經”、“舊法”、“經留廿七部”等字樣，由此推斷在公元7世紀的前半期，聖經或其部分經卷已譯成漢語。有“改正教最謙遜而最能幹的傳教士”之美譽的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認為：“由於這不易朽爛的石碑所留存下來的記錄，我們可得到一個極可靠的印象，就是在第7世紀的上半葉，最少新約已經譯成中文。”<sup>(5)</sup>〈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因而成為基督

教傳入中國以及聖經譯成中文的最早證據。但由於迄今尚沒有發現這批譯本，因此有關它們的一系列問題如譯者、年代、翻譯目的、範圍等都無從查考。

至於天主教士的聖經翻譯，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紀，到元大都（今北京）開教的約翰·蒙特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把舊約詩篇和新約全書譯成蒙古文。<sup>(6)</sup>英國人湯森認為約翰·蒙特高維諾到北京後，漸漸精通了漢語，並把《新約全書》與《詩篇》譯成中文<sup>(7)</sup>，顯然是臆測之說。16世紀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後，利瑪竇等用中文寫作了不少詮釋《聖經》和介紹《聖經》史實的書，像1584年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的《天主聖教實錄》、1595年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天主實義》、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的《受難始末》、1635年艾儒略（Giulio Aleni）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陽瑪諾（Emmanuel Dias Junior）的《聖經直解》等，雖然其中含有許多《聖經》經文，但卻不能稱之為正式的《聖經》中譯本。但據明末遊歷北京的一位意大利人記載：“歐洲傳教士為促使中國人醒悟，印行了

\*譚樹林，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中外關係學院教授。本文為作者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11屆（2003-2004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所作的課題研究論文之一。



馬禮遜牧師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乃基督教更正派來華的第一位傳教士，於一八〇七年九月四日抵達澳門，主要著作有《華英字典》與《舊約聖經》《神天聖書》。馬氏及其家人安葬在澳門白鴿巢公園前地基督教墓園。

五百部上帝律法之書，這是他們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完成的；他們還翻譯了聖托馬斯的著作和《聖經》。”<sup>(8)</sup> 18世紀初，巴黎外方傳教會教士巴設（J. Basset, 1662-1707）把拉丁文《聖經》譯成中文，包括《四福音書合參》、《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和《希伯來書》第一章，有人把這個譯本稱為“第一本天主教中文聖經”<sup>(9)</sup>，但祇是抄本。所幸該抄本輾轉為大英博物院收藏，馬禮遜在倫敦學習中文時，曾謄抄了一份並把它帶到中國，成為馬禮遜翻譯《新約聖經》的藍本。18世紀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將《舊約》和《新約》的大部分譯為中文，題為“古新聖經”，實為耶穌會士較具規模的聖經翻譯工作，祇可惜沒有刊印。<sup>(10)</sup>

此後，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斷斷續續地從事譯經，但均不過是一些片斷的翻譯而已，而且大多沒有在中國流傳下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其根源當在於天主教士主張“聖經譯本必須限制不得流傳於民間”，結果造成“聖經或其譯本祇限於某種私人使用，從來未曾准許公諸大眾”<sup>(11)</sup>的局面。由此也可以得到解釋，為甚麼徐光啟向傳教士提出了翻譯聖經的計劃，卻沒有被西教士接受。<sup>(12)</sup> 這乃是天主教傳入中國三個多世紀後，尚沒有出版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國第一部天主教的聖經中文全譯本直到1968年才面世，它就是《思高譯本》<sup>(13)</sup>，這也是天主教在華傳教以來唯一的一部白話聖經全譯本。<sup>(14)</sup>

與天主教士不同，基督教〔指新教〕士重視聖經普及流傳民間的工作。他們的最大願望，就是期待人人都能用本土方言誦讀《聖經》，這樣他們向海外傳教之際，便將把聖經翻譯為別國文字視為“配合傳道工作的重要任務”<sup>(15)</sup>。1804年9月，倫敦傳教會計劃派馬禮遜前往中國時，就確定其主要的任務就是將聖經翻譯成中文。馬禮遜抵華後，滿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使他無法公開宣道，祇好努力從事文字宣教工作，而“翻譯聖經是馬禮遜等人在佈道方面從事的最重要的工作”<sup>(16)</sup>。

1807年馬禮遜到達廣州不久，在對中文有了初步的掌握後，就開始翻譯《聖經》。其譯經受巴設譯

本的影響很大，特別是《新約》部分的翻譯，馬禮遜就是以巴設譯本作為藍本，此外“還參考了在華天主教傳教士的一些零星譯文、中文拉丁文字典，並得到了我的中文老師不斷的、具體的協助。”<sup>(17)</sup> 1810年譯完第一卷《使徒行傳》付梓，次年又將《路加福音》刊刻。至1813年夏，《新約全書》譯完，1814年在廣州印行。<sup>(18)</sup> 舊約有一部分為米憐（William Milne）所譯<sup>(19)</sup>，稿成後均經馬禮遜親自校閱，始成定稿。馬禮遜譯本於1823年在馬六甲以“神天聖書”為名出版，因係馬禮遜和米憐合作翻譯而成，通常稱為“馬禮遜、米憐譯本”。<sup>(20)</sup>

馬禮遜譯本作為中國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它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它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當時中國嚴禁傳教士佈道的情況下，翻譯和散發中文《聖經》及其它宗教小冊子成為當時在華傳教士最重要的傳教工作。湯清把中國基督教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即開創時期（1807-1842）、廣傳時期（1842-1907）、中國教會時期（1907-1949）。開創時期聖經漢譯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全部聖經都譯成了中文”，即使在廣傳時期，“聖經的翻譯”仍然“是最重要的文字事工”。<sup>(21)</sup> 許多華人正是通過閱讀中文《聖經》，心靈受到震撼，從而對基督教產生興趣，有的甚至皈依基督教，而這正是馬禮遜所渴望看到的：“他渴望自己的成果能感動那些他所接觸的本地人的心靈。”<sup>(22)</sup> 據馬禮遜日記所記，他的中文老師高先生在讀了聖經後“幾天不禱告，他已經感到心有不安。我為這個覺醒的靈魂而祈禱上帝。”<sup>(23)</sup>

其次，馬禮遜譯本奠定了以後基督教譯經工作的基礎。馬禮遜譯本雖具有開創意義，但嚴格說來，包括馬士曼譯本在內，“它們祇能應付當前宣教上的迫切需要，而內容方面尚有不少未臻完善的地方”<sup>(24)</sup>。馬禮遜自己也意識到譯本的不完美，所以譯本出版後，仍“嘗以修改中文聖經之錯處為其日中之事務”<sup>(25)</sup>。他還曾希望他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從事聖經重譯工作。祇是由於馬儒翰忙於公務，未能如願。<sup>(26)</sup> 慕維廉博士曾特別指出，馬禮遜譯本“所成功的且

極有用於後來之踵其事者”<sup>(27)</sup>，馬禮遜譯本為後來新教徒的譯經提供了藍本。“四人小組譯本”就是以馬禮遜譯本為藍本進行修訂的。1835年，由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實獵（Charles Gutzlaff）、裨治文（E. C. Bridgman）和馬禮遜之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組成四人小組，對馬禮遜譯本進行重新修訂。重譯工作首先從《新約》開始，新約部分於1835年完成，經麥都思作最後訂正，1837年在巴達維亞以石版印行，定名為“新遺詔書”。在以後的十年至十二年間，中國的新教教會都以這冊為主要的《聖經》譯本<sup>(28)</sup>，足見其影響之大。舊約部分於1838年完成，1840年印行，大部分為郭實獵所譯。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曾將部分舊約經卷印發，稱為“舊遺詔聖書”，其印行聖經的目的除了在禮拜時供信徒誦讀外，還被用作開科考試的題目。洪秀全曾下令將《創世紀》、《出埃及記》和《馬太福音》作為應試員生之參考本。<sup>(29)</sup>

總之，以馬禮遜譯本為嚆矢，到1875年前，聖經譯本的數量已蔚為大觀，中文聖經已經有二十七部用當時通用文體翻譯的譯本，還有九十九部用十種土話翻譯的譯本。中文全譯本已有七部，新約譯本有九部。<sup>(30)</sup>到1919年時，不僅數量大有增加，種類漸趨多元化，甚至出現了數種少數民族語言的聖經譯本。<sup>(31)</sup>

### 第一所教會學校 —— 英華書院

提起中國近代教育的變革和發展，人們自然就會想到來華傳教士創辦的教會學校。的確，近代來華新教傳教士的教育活動與中國從傳統的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體制的轉變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這樣說，教會學校是中國近代教育變革的溫床。遺憾的是，在論及這種影響時，國內外學者往往祇關注鴉片戰爭後傳教士所辦的教會學校，而對此前期新教傳教士在澳門、南洋等地所辦旨在教育華人



1818年馬禮遜、米憐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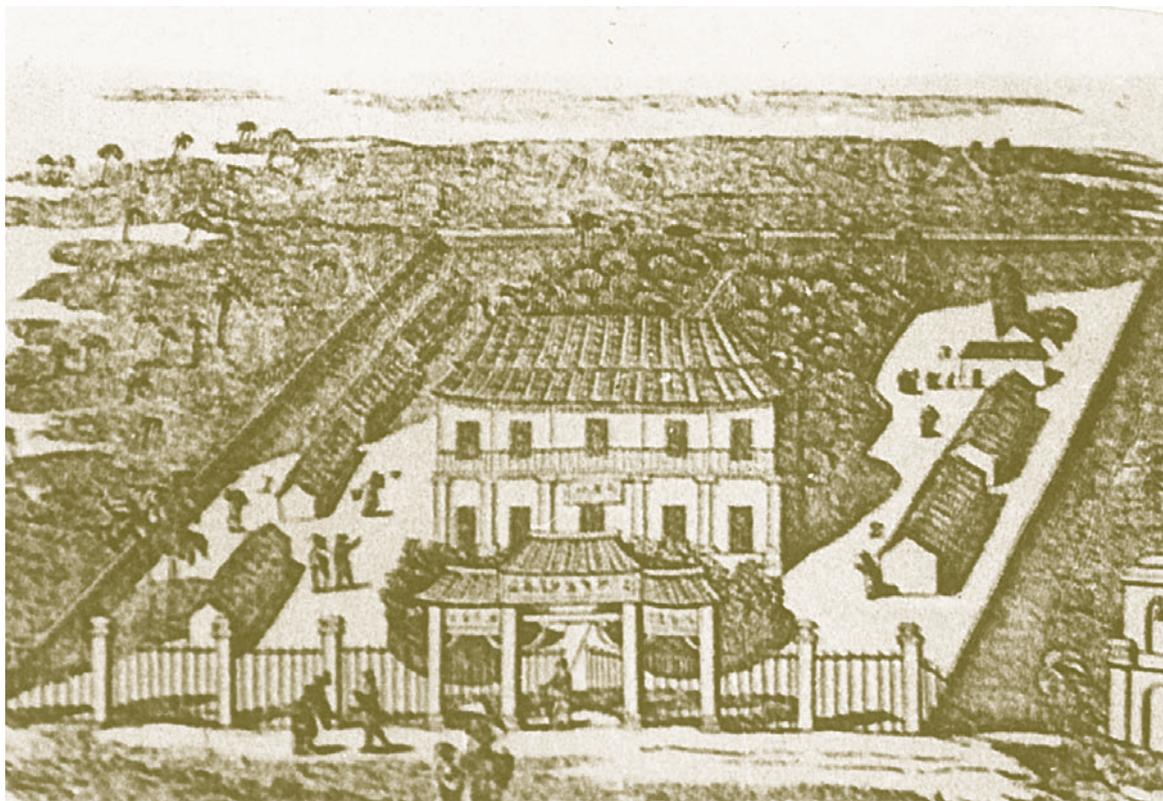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Miss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的學校重視不夠。實際上，中國近代第一所採用西式教育制度的學校是馬禮遜和米憐在馬六甲開設的英華書院，它成為以後在華所設的教會學校的圭臬，所以近代新教傳教士開辦學校從事教育，馬禮遜當是始作俑者。

馬禮遜創辦英華書院，目的就是為了傳教。在1812年年底給倫敦傳教會的信中，馬禮遜明確聲明：“我希望我們能在馬六甲有一所學院以便訓練歐洲籍居民和當地的中國居民能夠成為傳教士，這樣就可以派他們到恆河以東各國傳播基督教。”<sup>(32)</sup> 倫敦傳教會同意馬禮遜建立英華書院的設想，1815年10月，馬禮遜在《印支搜聞》上公佈了籌建英華書院的消息，立即得到來自印度、美國、英國等的捐款贊助。馬禮遜本人率先捐款1,000鎊，並認捐每年100鎊，以五年為限。倫敦傳教會為表支持，也捐500鎊。東印度公司每年捐贈1,200鎊，以資助英

華書院的發展。在地皮和資金都已基本齊備的情況下，英華書院於1818年11月11日在馬六甲舉行奠基禮，基石上用拉丁文刻着：“1818年英華書院的建立，乃創辦人馬禮遜博士贊助及貢獻之功。”<sup>(33)</sup> 1820年學院開始正式招生。

英華書院的近期目標是“推進英國與以中文為書面語的國家之間友好的文化交往”，但其最終目標是“作為一種使恆河外方讀或說中文的各族皈依基督信仰的手段”。<sup>(34)</sup> 決議案明確規定：英華書院必須嚴格實施以傳教為目的的教學方案，開設的課程原則上必須與傳教的目的有關，如欲開設其它與此目的無直接關係的課程時，必須以不損害此目的為前提，否則將造成學生祇學習世俗課程，違背了創辦英華書院的原則。英華書院的教育正體現了這個目標。在教學內容上，宗教佔了絕大部分，還要參加宗教活動，但也開設中外文學、歷史、地理、



英華書院教學樓

從1820年開始招生辦到遷往香港的1834年截止共培養了四十名畢業生

哲學等課程，尤重學生閱讀中國經典。在〈附則〉中還規定，隨着書院的發展，將陸續開設機械學、化學、博物學、植物學、幾何學和高等數學等。學院的計劃是把人類知識的各個分支都考慮在內。以後教會學校的課程設置均以英華書院為圭臬。

英華書院建立後，一些學校陸續開辦起來，如譚信牧師（Rev. Thomson）開辦的馬來語學校、1822年宏富夫人（Mrs. Humphreys）主持的馬來語女子學校、1825年穆爾牧師（J. H. Moore）創立的英語免費學校、印泰坦米爾語學校、中文學校等，以中文學校為主。<sup>(35)</sup>

英華書院從1818年奠基，1856年解散，存在了將近四十年，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它對基督教新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頗具意義。有論者認為，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從事教育，乃由於普通中國人對他們傳教努力的抵制，而不是為了中國的教育目的，祇是把它當作為基督教真理找到一批受制聽眾

的工具。<sup>(36)</sup> 褒敦博士在談到教會學校的目的時也說：“當時各傳

教師的意思並不是想替中國建設一個學校系統，他們所

辦的學校不過是認作傳教的一種工

具……他們的目的不外兩種：

第一種目的是把兒童引到基督福音勢力範圍之下，使他們時時受其熏染；第二種目的是等到他們自己已經信仰了宗教，就給他們一種預備，使他們能把福音再傳給別人。”<sup>(37)</sup>《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

也認為，“基督教會之學校初非專門之教育家

所設立，其志亦不在教育人材以促進教育之進步，乃欲以學校為一種補助之物，以助其宣傳福音之業。”<sup>(38)</sup>可見教會學校之設，實為一種傳教的手段。而馬禮遜、米憐還有倫敦傳教會，都把英華書院看成是向恆河外方各國尤其是向中國傳播

基督福音的工具。1819年，倫敦傳教會繼任司庫漢基先生在給馬禮遜的信中說：“我認為你開設英華書院是一項崇高的創舉，它必將對在東亞地區的傳教事業產生巨大的影響。”聖教書局（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司庫雷諾爾（J. Reynor）在給馬禮遜的信中說：“我堅信這裡的朋友們都認為你在馬六甲設置傳教差會和創辦的英華書院是最好的選擇，它們將成為最有效的盛舉。我深信其意義將遠超過我們所設想的。基督教的亮光和智識必將在整個中華帝國和周邊的屬國廣為傳播。”<sup>(39)</sup>英華書院的確培養了許多歐洲籍和中國籍傳教士。馬禮遜之子馬儒略曾在英華書院學習，以後參與四人小組重譯《聖經》；宏富禮牧師（James Humphreys）曾在英華書院學習，在米憐去世後接任英華書院院長；高大衛（David Collie）係蘇格蘭人，1822年6月24日入英華書院學習，繼宏富禮牧師之後任英華書院院長，對英華書院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中國人梁發、屈昂等均曾在此求學，而在英華書院學習的中國人最著名的當屬何進善，日後成為第一位華人牧師。<sup>(40)</sup>何進善，又名何福堂，1840年入英華書院就讀。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當時的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James Legge）就有把倫敦傳教會總部及英華書院遷入內地之想，其後馬儒翰主張遷到香港



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



郭實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

最為合適。<sup>(41)</sup>因此，英華書院於1843年遷往香港，當時隨理雅各遷往香港的除了梁發、屈亞昂、印刷工人何亞新外，還有四名隨遷的學生，其中就有何進善。他精通中國古代典籍，又有較好的英文和希伯來文修養，曾協助理雅各從事文字佈道事業。1846年10月，在香港合眾禮拜堂，何進善被按立為牧師，成為中國第一位華人牧師。他還曾與湛約翰牧師同往廣東佛山創立倫敦會禮拜堂，他的兒子何啟，曾留學英倫，回港後創辦香港雅麗氏醫院，並成為早期中國鼓吹維新的人士之一。

其次，英華書院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弗拉澤爾（W. Frazer）在談到英華書院時說：“馬六甲的英華書院不僅展示了這些目標（傳教等）的希望，而且向東亞的土著人傳播了歐洲文學知識，在各種有用知識的分科上，都實施了教育，西方的先進文明已向中國、安南和東部藩屬的人民展示了其不可估量的價值，敞開了廣闊的大門，這有助恆河外方各族消除長期以來存在的反抗外國人的偏見。”<sup>(42)</sup>東印度公司貿易委員會主席馬力班克斯（Charles Majoribanks）說：“我訪問書院時，那兒有三十多名學員，如果書院的資金再雄厚一些，那麼她成功的機會必然更大。我們滿意地聽到，幾乎每個人都能熟練地用中文和英文閱讀聖經，許多人能用中文熟練地寫作，對算術、地理、地球儀的應用和一般的歷史知識相當精通。因此，馬六甲一個農民的兒子得到的那種文明教育，中國皇帝的兒子也得不到。”<sup>(43)</sup>就西方知識而言，確然如此。

當然，英華書院最大的影響還在於它開創教會辦學的先例，開創了以教育傳播福音的先例。自從馬禮遜1818年在馬六甲創設英華書院後，1819年就有麥都思在檳榔嶼創立學校、恩士牧師（Rev. John Ince）在檳榔嶼創立一所華人學校<sup>(44)</sup>，還有美爾敦牧師（Samuel Milton）、裨治文，甚至梁發也曾和古先生合設一私塾，“那私塾是中國內地第一所更正教教育機關。梁先生利用中國歷來尊師重道的傳統思想以進行傳教工作”，但後來“梁發被指為宣傳迷信，且將國賣與外人，他的學塾被解散。”<sup>(45)</sup>其

它幾所類似學校也因礙於環境，終沒能持續長久而告停辦。<sup>(46)</sup>

儘管如此，教會教育對傳教的重要性廣泛被傳教士所接受。1834年馬禮遜去世後，澳門的新教傳教士和英美商人為紀念馬禮遜在教育上的功績，倡議成立馬禮遜教育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1836年9月28日，馬禮遜教育會在廣州美國商館舉行成立大會，確定該會的宗旨是：“在中國開辦和資助學校，在這些學校裡除教授中國少年中文外，還要教他們英文，並通過這個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種知識傳到他們手中。”<sup>(47)</sup>裨治文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他說：“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會、國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時期內任何陸海軍力量，比最繁榮的商業刺激，比任何其它一切手段的聯合行動，都會產生更為巨大的變化。……對中國的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各部門作出改進的前景，幾乎是無止境的。……按照中國的



中國近代第一位著名西醫黃寬

黃寬早年畢業於澳門馬禮遜學堂，1847年與容閱一起隨校長布朗去美國，在馬塞諸塞芒松學校讀高中，兩年後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1857年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1858年回廣州行醫，並在海關兼任醫官，1878年因積勞成疾去世。





中國首批赴美留學幼童（清·同治十一年，1874）

俗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旦開始，就必須繼續幹下去。這樣做，教育就會得到推廣。如此，整個中國將會受益，我們的事業最終也會成功。”<sup>(48)</sup>馬禮遜教育會在1839年成立馬禮遜學校，聘請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生布朗（Samuel R. Brown）任校長。馬禮遜學校在布朗的主持下，既開設中文課程教授四書、詩經、易經、中文聖經等，又開設西文課程教授天文學、歷史、地理、數學，知識面遠比一般的學塾廣闊。因此，馬禮遜學校是一所傳播新知的學校。中國著名的改良家容闈、黃勝、黃寬等都是該校的學生，三人於1846年赴美留學，是中國近代留學美國的開始。黃勝歸來後成為著名的西醫。容闈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歸國後，倡導計劃，促成清政府於1872年至1875年派遣四批幼童赴美留學，許多人學有所成，對中國近代文明產生了重要影響。中

國第一條鐵路的設計師詹天佑就是赴美留學的幼童之一。

鴉片戰爭後，新教傳教士雖然獲得公開自由傳教的權利，但他們對馬禮遜開創的教育傳教情有獨鍾，全國各地都有教會學校，而且規模日益擴大，不僅小學、中學，甚至辦起了不少大學。到1875年，教會學校的總數約達八百所，學生有三萬人，其中新教約三百五十所，學生六千人。1877年，在新教學堂中有六千人就讀。到1890年上昇到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六人。<sup>(49)</sup>祇是近代的教會教育，已不再單單被視為傳教的手段，已更多地帶有政治動機。1890年在華傳教士大會上，狄考文（Calvin W. Mateer）說：“真正的基督教學校，其作用並不在單純地教授宗教，從而使學生受洗入教。他們看得更遠，他們要進一步給學生們訓練……成為社會上及

在教會中有勢力的人物，成為一般人民之導師和領袖。”<sup>(50)</sup>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時，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致函美國總統羅斯福說：“哪個國家能在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的事上成功，哪個國家就會由於付出一定的努力，而在道德知識和商業的影響取回最大可能之收穫。如果美國早在十五年前就做到把中國學生之潮流引到美國來，並使這個潮流不斷壯大，那麼，我們今天就一定能夠通過從智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領袖們，來對中國的發展進行一種令人滿意的又最為巧妙的控制。”<sup>(51)</sup>

儘管如此，教會教育對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貢獻及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余日章說：“中國近世教育史，學校之創立，精神形式，悉有基督教會，梯山航海，轉運而東，基督教對於中國教育之一途為今日新教育規獲，早為國民所公認。”<sup>(52)</sup>可以說，教會教育開啟了中國近代教育之先聲，而這一切皆以英華書院為濫觴。

### 第一部中英字典：《華英字典》

近代西人研究中文及編纂字典，緣起於16世紀東來傳播基督福音的天主教傳教士。傳教士們認識到，要順利在中國傳教，必須掌握中國的語言文字，而編纂中西辭典無疑是學習中文的最佳途徑。在這方面，傳教士作出了重要貢獻，如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刊印的《西字奇蹟》，是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的開始；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在中國學者王徵的協助下，1626年刊刻的《西儒耳目資》係參照《洪武正韻》和《韻會小補》編成，對中國音韻史研究有重要意義，被羅常培先生稱譽為“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音韻學上的第一個貢獻”<sup>(53)</sup>。明末清初學者王徵、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等都傾心於拉丁拼音，對《西儒耳目資》極為推崇。

與歐陸國家相比，由於英國在17-18世紀與中國的交往是以商業貿易為主，來華商人僅限於與行商接觸，其間以中國舌人和買辦居中翻譯，因此英國人對中國語文認識極有限。<sup>(54)</sup>直到19世紀初，在英國祇有喬治·斯當東一人懂得中文。1792年馬

爾尼伯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使團訪問中國，當時祇有十一歲的喬治·斯當東因從兩位中國留學生翻譯學習中文，成為使團中唯一能用官話和乾隆皇帝談話的英國人，深獲乾隆皇帝獎賞。<sup>(55)</sup>後來，斯當東長期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分行任職，曾翻譯出版《大清律例》，在漢學上有所成就，被稱為“第一位英國漢學家”<sup>(56)</sup>。無論從基督教在華傳播事業還是中英商務發展，都亟需改變英國在中文知識的落後狀況。倫敦傳教會規定馬禮遜來華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編纂一部中文字典，它要超過以前任何這類字典”<sup>(57)</sup>，顯然是出於這種考慮。

《華英字典》的編纂始自1808年8月。《華英字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題名“字典”，以漢字部首為序，實為漢-英辭典，分為三卷。這部分篇幅最多，約佔總頁數的五分之三。<sup>(58)</sup>“字典”部分主要依據《康熙字典》編譯而成，這從兩點可以看出：首先，“字典”中的部首和部首中的字根及其排列全都依據《康熙字典》，一個不多，一個不少；收字也全部按《康熙字典》，且字與字之間的次序也完全相同。其次，馬禮遜《字典》從四書五經中引用的例句，存在許多引例刪節失當、脫文衍字之現象，奇怪的是馬禮遜《字典》中的“刪節失當和脫文衍字之處恰恰和《康熙字典》的失漏相一致。而英文解釋不當處，被解釋的文字也正好是出自《康熙字典》的引例，說明並非在原書上看懂後摘引，而是轉摘自《康熙字典》。”<sup>(59)</sup>但確如葉再生先生所說，馬禮遜在編撰《字典》的過程中大量參考和使用了中國人編著的文獻資料，但馬禮遜不是簡單地翻譯，更不是抄襲，而是傾注了其全部的心力和才智。

第二部分叫“五車韻府”，以漢字音韻為序，也是漢-英辭典，分為兩卷。《五車韻府》的編纂，馬禮遜在前言中提及它是以清朝一位陳先生的著作為藍本的。作為藍本的這部著作，據說是陳先生花了一生時間編撰而成，但他在出版前去世。他把手稿託附給他的學生含一糊(Han-yih-hoo)。含一糊為了解釋、補充它，遊歷了整個中國。陳先生的門生中，有一位叫潘應賓的，後來做了大官。《康熙字典》編纂時，他的學生交出這部手稿，因此它對《康

熙字典》的編著起了很大作用。馬禮遜設法找到這部著作，經過編輯、調整，並加上英文後，就成了這部字典的第二部分《五車韻府》。<sup>(60)</sup> 由此可見，《五車韻府》主要據這位陳先生的著作編譯而成。同時，馬禮遜還提到“在編撰《五車韻府》時，還參考了《康熙字典》和羅馬天主教士按字母排列編著的《字母字典》(Alphabetic Dictionary)”<sup>(61)</sup>。此外，馬禮遜還參閱過《分韻》、《佩文韻府》、《爾雅》等。

《華英字典》第三部為《英漢字典》，一卷，內容包括單詞、片語成語和格言的英漢對照，解釋頗為詳細。與前兩部不同是，這部是英漢辭典，前兩部都有中文辭典如《康熙字典》和《五車韻府》等為底本，而英漢辭典此前中國沒有。雖然來華之前，馬禮遜曾從倫敦皇家學會借出《拉丁漢語字典》謄抄一遍，但有人對比後，發現二者出入很大。<sup>(62)</sup> 可見，馬禮遜編纂《英漢字典》沒有底本可供參考。因此，雖然這部分篇幅不長，但比第一、二部分要難得多，無怪馬禮遜在《英漢字典》前言中就說：“自從作者為本字典收集辭彙，已經過去十三年歲月。在此期間，不斷對其增補，但是中文與英文相對應的字全部搜集起來，這樣的著作對一個人來說太廣泛了。即使窮盡一生，要使它完美也是不可能的。”無論單詞、片語和句子等，編纂的原則是先給出英文，然後是中文，最後再用拼音寫出。在《英漢字典》最後，馬禮遜又給出中國的度量衡、曆法、土地丈量 and 里程計算法<sup>(63)</sup>，尤其是度量衡知識的介紹，對西方商人的對華貿易，很有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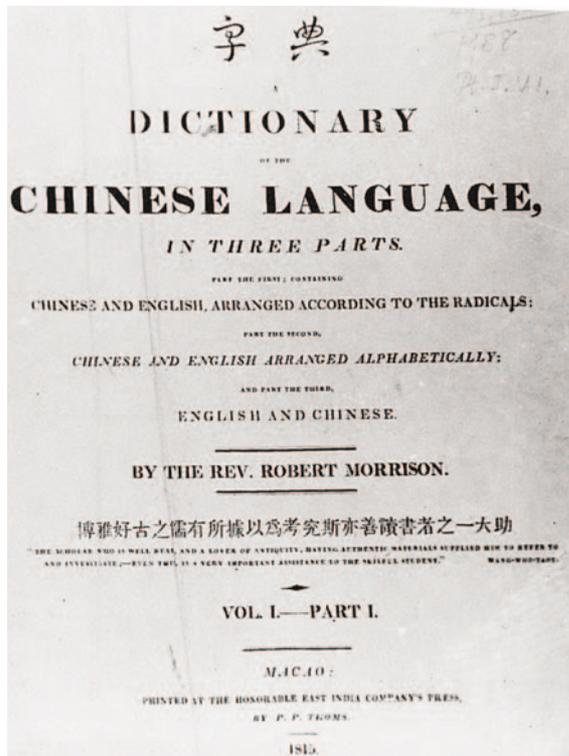
《華英字典》從1815年出版第一卷，到1823年才在澳門全部出齊，前後經歷了八年的時間。它的出版對西方漢學的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史都具有重要意義。《華英字典》富含有關中國歷史、地理、宗教、文化、哲學、政治、風俗、禮儀等方面的內容，實為一部關於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sup>(64)</sup> 英國學者湯森說：“這部字典，幾乎既可以當做一部字典，又可以當做一部百科全書使用，它包括了有關中國的傳記資料、歷史和民族風情、禮儀和國家制度的評介，是一部匯集了有關中國人的生活和歷史文獻的最豐富的資料的工具書。”<sup>(65)</sup> 在歐美漢學界

享有盛譽，德累斯頓的博學的東方學者蒙杜齊博士這樣評價《華英字典》：“我很坦率地說，馬禮遜博士花了十年的時間出版的這部多卷本的字典，對歐洲學者的作用遠勝過上個世紀所有傳教團印刷的著作和手稿。”<sup>(66)</sup> 尤為重要的是，《華英字典》作為第一部英漢辭典，它開啟了19世紀傳教士及其他西方學者編纂類似辭書的風氣，《華英字典》被以後寓華傳教士在編纂英漢辭典時奉為“圭臬”。<sup>(67)</sup>

馬禮遜之後，新教傳教士們編纂了各種類型的中文辭典達十七種之多。受《華英字典》影響較大的是衛三畏編纂的《英華韻府歷階》(*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此書在道光癸卯年(1843)由澳門香山書院發行。這本辭典可以說是單詞對譯表。衛三畏在序言中說：“在字典編著過程中，除了應用中國人的著作外，編者還從馬禮遜那裡摘錄了他認為有用的一切。”<sup>(68)</sup> 的確，衛三畏的辭典中的有些詞條與馬禮遜《華英字典》中的一模一樣，祇是在漢字注音上存有不同。此外，麥都思的《福建省土話詞典》(*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受《華英字典》影響較大。麥都思所依據的除《康熙字典》外，主要的就是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和“一部未留下作者姓名的拉丁文—中文詞典的手稿”。麥都思的《福建省土話詞典》有些詞的解釋幾乎將馬禮遜的譯詞全部採納，祇是加以補充。例如“坊”這個詞，麥都思詞典的解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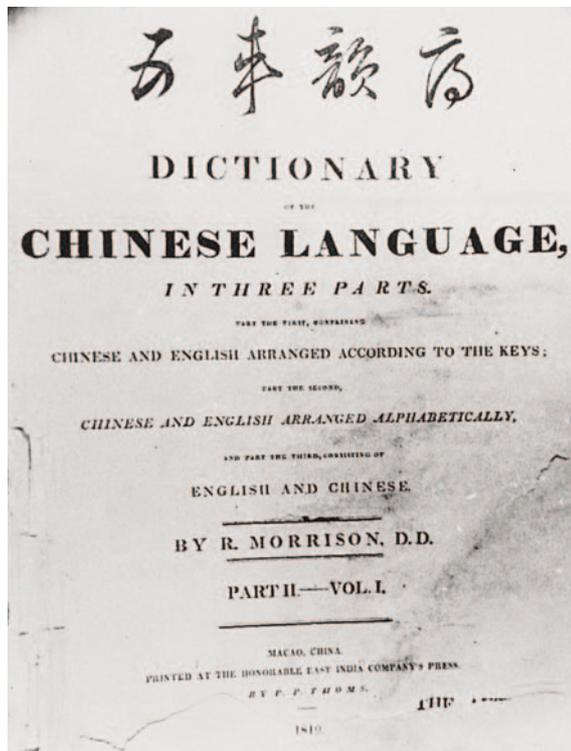
lane: 坊 fang; 巷 heang; 衢 keu; tung; hang; a bye-lane 僻巷 pe heang, a lane in without a thoroughfare, 窮巷 keung; a lane in Peking is called 胡同 hoo-tung。

後面為“胡同”一詞連同英文說明，似乎都出自馬禮遜的字典。馬禮遜在《華英字典》裡的一句誤譯“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One word from Wei-ching (an eminent statesman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better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masters”，這裡馬禮遜誤把“師”誤譯成“教師”，而沒有譯成軍隊。麥都思在引用這句時，祇是把“masters”改為更直接的“teachers”，從二者所存在的相同的錯誤，可



《英華字典》第一卷封面

馬禮遜於1808年着手編纂，1815年出版第一卷，取名“字典”。這是按照嘉慶十二年刻刊的《藝文備覽》英譯的，漢-英對照，依漢字筆劃分成二百十四個字根排列，書後附有字母索引。（原書藏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圖書館/顧衛民提供）



《英華字典》第二卷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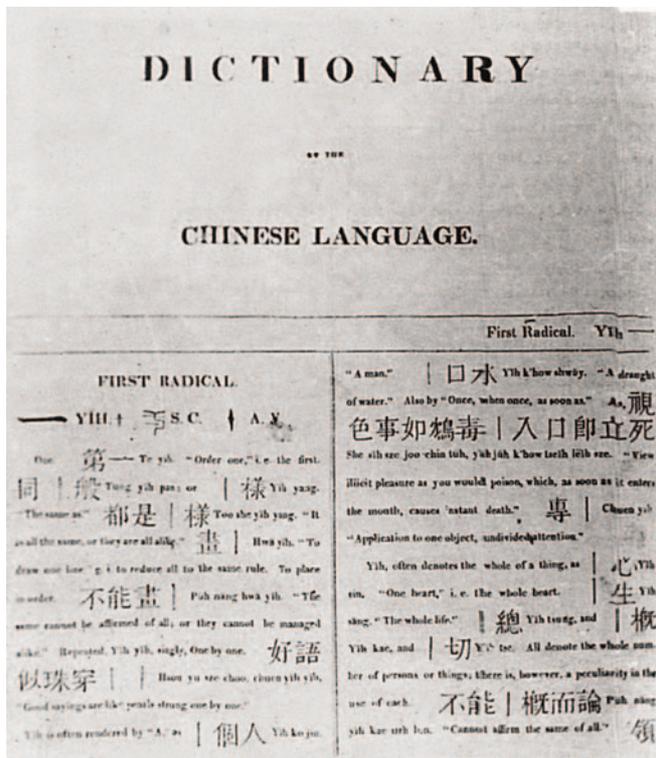
第二卷第一部分於1819年出版，書名“五車韻府”，按英文字母編排。1820年出版第二部分，在〈附錄〉中把漢文書寫體按拼音分別將楷書、行書、草書、隸書、篆書、古文六大類列出。（原書藏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圖書館/顧衛民提供）

以看出麥都思的字典受馬禮遜字典影響不小。即使沒有這種誤解，兩人字典引用相同的例句，也能說明前者對後者的影響。但是，麥都思的辭典較馬禮遜《華英字典》要小，所收漢字也少一些，然而編排上更加科學，在羅馬字母注音上也有所改進。這當是比馬禮遜《華英字典》後出的結果。

《華英字典》不僅對漢英辭典的編纂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對日本英日辭典的編纂也產生了很大影響。《華英字典》出版後不久，就有日本翻譯家準備把它譯成日文。1828年11月18日，馬禮遜在一封信中寫到：“今天遇到一位從日本來的外科醫生叫布爾格（Burgher），他在荷蘭人中服務過。他告訴我，日本翻譯家正在把馬禮遜的《華英字典》譯成日文，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奇而又有趣的事實！堅

定了我在世界的這個地區使用出版物的信念。我希望《聖經》不久也能譯成日文。”<sup>(69)</sup> 布爾格還告訴馬禮遜：在長崎（Nagasaki），日本人喜歡在他們的扇子上寫着從馬禮遜按字母排列的《字典》中摘錄的段落，作為一種裝飾，彼此相互贈送，可見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在日本很受推崇。馬禮遜曾給一位日本翻譯家 Gonoski Kokizas 寄去《華英字典》的訂購單，布爾格還建議馬禮遜給這位日本翻譯家寫信。馬禮遜是否寫過，現在尚無材料證明。

根據日本方面的材料佐證，馬禮遜的《華英字典》確曾引起日本人廣泛注意，並予以購買。《新撰洋學表》天保二年（1830）項有“英人馬禮遜所譯漢文書天文臺譯局下附”的記載，大如電注曰：“譯員青地林宗有記……曾聞英圭黎人模利崧（即英吉利



《英華字典》第三卷內頁書影

此書出版於1822年，名為“英漢字典”。內容包含單字、詞彙、成語、句型等英漢對照。整部字典1823年出齊共六大本，合計4,595頁。  
(原書藏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圖書館/顧衛民提供)

及馬禮遜日文譯音) 來於媽港，以英語譯支那文，即成巨冊……今茲庚寅(即天保元年)初夏，官得其書數篇，下諸吾學社余輩得始是之……又據佐久間象山說，漢字注以英語，洋語釋以漢文字者，始於英人莫栗宋(馬禮遜)，荷蘭通譯吉雄永保，取莫氏之書，扶英以荷，以纂此書，英和對譯字書該是此書吧！”<sup>(70)</sup>

另據安政二年(1855)，長崎奉行勸告唐通事們停止兼學滿語而改學英語，並要求從清朝購買馬禮遜的《五車韻府》。他們具體地提到這本書，說明在當時的長崎這本辭典已廣為人知，同時也證明布爾格的話是可信的。1857年長崎西役所內開設了洋學傳習所，在許可其成立的老中堀正睦的“索書單”中，也有“《五車韻府》取寄字樣”<sup>(71)</sup>，甚至韓國早期的英韓辭典也有受《華英字典》影響的痕跡。<sup>(72)</sup>

## 第一份中文月刊報紙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19世紀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在傳教方式上有別於耶穌會士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是在中國境內外創辦一些中外文報紙期刊，作為其傳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國近代報刊，幾乎全由外國傳教士創辦。據統計，到19世紀末，外國人在中國共創辦近二百種中外文報刊，佔當時我國報刊總數的八成以上。<sup>(73)</sup>其中絕大多數為傳教士倡辦。在這方面，馬禮遜同樣開風氣之先，他和米憐(William Milne)於1815年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以下簡稱《察世俗》)是近代最早的中文月刊報紙，被譽為“中國近代雜誌的第一種”、“中國近代報業的開山鼻祖”。<sup>(74)</sup>

以馬禮遜為代表的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之所以在中國首創報紙期刊作為輔助傳教的手段，實是滿清政府實施嚴厲禁教政策的結果。馬禮遜和米憐創辦《察世俗》的目的，是希望通過這份雜誌，輔助傳教的進行。因此，基督教教義的闡述，就成為《察世俗》的“根本要務”。<sup>(75)</sup>《察世俗》的編務由米憐全盤負責，所刊載的文章亦多出自他之手，封面書“博漢者纂”，“博漢者”即米憐的筆名。米憐在談到《察世俗》的內容時說：“神理、人道、國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但“最大是神理，其次是人道，又次國俗。是三樣多講，其餘隨時順講。”<sup>(76)</sup>綜觀《察世俗》各卷，可知宗教和道德的內容佔該刊主要部分。米憐在1819年談到該刊的狀況時承認：“儘管有不少內容想要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上發表，但開始時卻難以付諸實行……到現在為止所發表的文章，主要屬於宗教、道德之類，少數關於最簡明的天文知識、有教育意義的佚事、事實的摘要，以及偶爾一些重大事件的報道，也給刊物的面貌帶來一些改變，但這方面實際發表的東西比應當發表的要

少。”<sup>(77)</sup>即使這些少許通俗的西洋知識的介紹，也如米憐所說，與其說是為了科學，不如說是為了與中國人的傳統天文學知識即“關於神和宇宙的錯誤觀念”對抗。<sup>(78)</sup>

鑒於《察世俗》的發行主要是面向華人，為了引起中國人的閱讀興趣，米憐盡量使《察世俗》適合中國人的口味，從內容到形式，都力求使中國普通人喜聞樂見。有些長文，編者採取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手法，分期連載，篇末加有“後月續講”的字樣，與章回小說中的“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如出一轍。由於當時中國朝野均視基督教為異端，馬六甲的華人中也不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淫而對基督教的傳播非常厭惡的人，因此它在宣傳用語時，極為慎重。在序言中宣揚“神理”是主要內容，但在具體傳教上，米憐等又非常注重通過各地的風俗、道德等展開傳教。他反覆指出，考察“萬世萬處萬人”才能求得客觀真理，所以如此，是為了避免與當地風俗習慣和社會文化相悖的傳教方式。《察世俗》封面的設計就體現了這種顧慮。上面從右到左橫刻“嘉慶丙子年”，在“嘉慶丙子年”下面的右上角印有孔子語錄：“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正中是很大的刊名，左下角印以“博愛者纂”。這樣米憐既避免了從正面攻擊儒家思想，刺激中國人，而且引用孔子的語錄，耶穌加孔子的宣傳內容和形式都清楚地表達出來。這種封面形式後來被多種報刊如《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所採用。可以說《察世俗》歸根結底是為了向中國人傳教而發行的一種中文定期出版物。<sup>(79)</sup>

《察世俗》刊載宗教文章的欄目主要有“古今聖史記”、“神理”等，米憐撰寫、發表一系列佈道文章如〈張遠兩友相論〉、〈諸國異神論〉、〈進小門走窄路解論〉、〈古今聖史記集〉等，其中一些“有價值的文章”（米憐語）後來又作為單行本出版，影響更大。像米憐的《張遠兩友相論》被人譽為可與利瑪竇的《交友論》相媲美，它借張、遠兩位鄰居共十二回合的對談，對基督教義給以較詳細的闡釋，是第一本有故事情節、敘事背景的傳教小冊子，而非開卷即說教，後來的傳教士公認此書對傳教的作

用，出版後一再重刻或增訂。據1833年10月裨治文的報告，當時這本書的單行本發行數已達五萬冊，遍及中國沿海、蒙古、琉球<sup>(80)</sup>；1861年時，已有十三種版本，至20世紀初年時，估計此書印行已多達數十萬至兩百萬冊，成為歷來最暢銷的傳教小冊子。<sup>(81)</sup>直到1907年，這本書仍然被看作是用中文著述的最有價值的基督教書籍之一。<sup>(82)</sup>另外作為單行本出版的，還有米憐的《進小門走窄路解論》（1816）、《古今聖史記集》（1819）、《全地萬國紀略》（1822）、《聖書節解》（1825）；麥都思的《地球便童略傳》（1819）等。據統計，到1819年，英國傳教會發行的中文書達140,249冊<sup>(83)</sup>，《察世俗》及刊載於《察世俗》的文章佔了大多數。由此可知，《察世俗》的發行對基督新教在東方傳教的重要性。

《察世俗》作為較早介紹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刊物，對西學東漸起到一定作用，但也刊載了非宗教性文章，介紹天文學、世界地理、地理學等科學知識以及各國的風土人情。在“天文地理論”欄目下，介紹天文學知識，刊載了〈論日居中〉、〈論行星〉、〈論侍星〉、〈論地為行星〉（附〈地每日運行圖〉）、〈論地周日每年轉運一輪〉（附〈人居地腳相對圖〉）、〈論月〉、〈論慧星〉、〈論靜星〉、〈論日食〉、〈論月食〉、〈天球說〉等，除文字說明外，還配以板刻插畫，共有六幅。米憐的這些文章介紹了近代西方天文學的重大成果日心說，通過這些文章和所附圖畫，向中國人介紹了地球運轉、日蝕、月蝕等科學知識，傳播了科學新聞。但是作為虔信上帝創造萬物、無所不能的傳教士，米憐最後往往又把這些現象都說成是神的所為，“若神一少頃取去其全能之手，不承當宇宙，則日必不復發火，天必不復下雨，川必不復流下”，所以“住天地之萬人，皆當敬畏神”<sup>(84)</sup>。在“全地萬國紀略”標題下，分“論有羅巴列國”、“論亞細亞列國”、“論亞細亞列國之話”、“論亞非利加列國”、“論亞默利加列國”、“論南亞默利加列國”等專題，介紹了世界五大洲各國的都城、人口、人種、政治制度、物產和語言等概況，旨在向中國人提供最簡明的各國地理和歷史知識。作為一份宗教性刊物，它之所以介紹自然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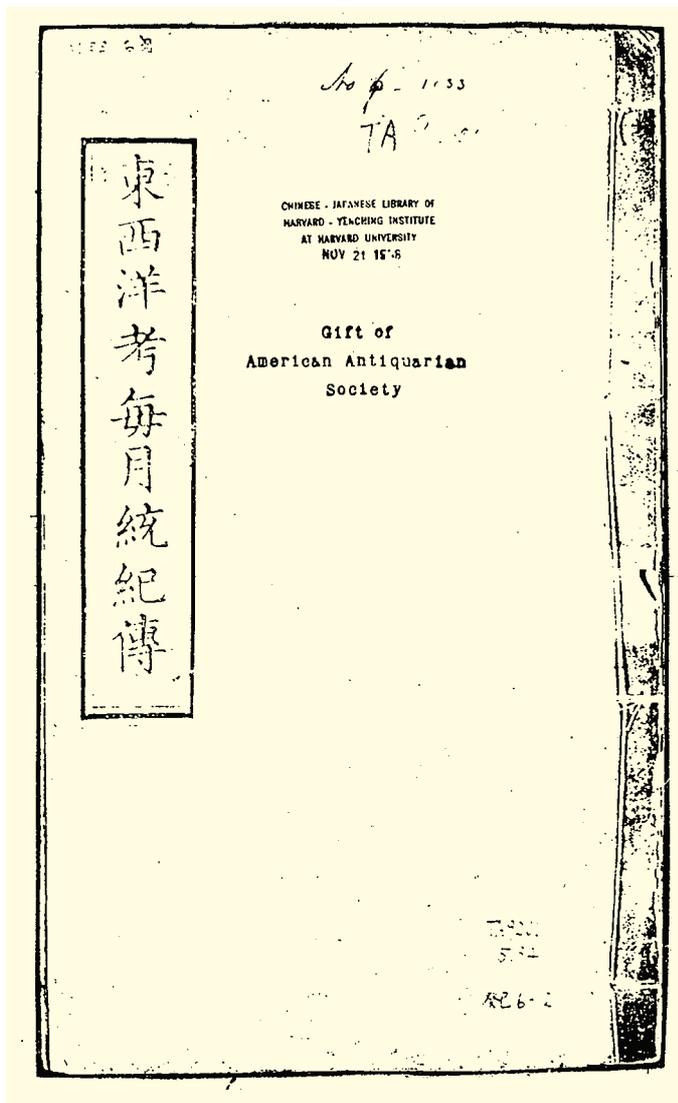
學及人文社科知識，是因為在米憐看來，“知識和科學是宗教的婢女，也可以用作增進德行的工具。”<sup>(85)</sup>

經過《察世俗》的成功嘗試，使馬禮遜、麥都思等新教傳教士，對於報刊雜誌在輔助傳教上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而感到這類宗教性雜誌應該繼續編印下去。《察世俗》停刊後，麥都思於1823年7月在巴達維亞創辦了《特選撮要每月統記傳》，這份刊物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受到《察世俗》的影響。封面上方橫排以清朝紀年的出版年月，中間為大字寫的刊名，刊名右側印有孔子語錄“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標明編者“尚德者纂”。該刊主要內容為宗教、時事、歷史、新聞等，1826年停辦。《天下新聞》由曾任英華書院院長的吉德(Samuel Kidd)於1828年在馬六甲創刊，為週刊，主要刊載中外新聞、科學、歷史、宗教等內容，麥都思撰寫的〈東西史記和合〉曾在其中一期上刊載。<sup>(86)</sup>但該刊存在時間不長，1829年便告停刊。

上述三種刊物皆創辦於南洋。新教傳教士在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種近代中文雜誌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以下簡稱《東西洋考》)。1833年8月1日在廣州創刊。1836年全年中斷，1837年在新加坡復刊，終止於1838年，迄今見到的共三十九期。主創者為德籍來華傳教士郭實獵。他創辦該刊的目的是向中國人展示西方文明，使中國人認識到洋人不是“蠻夷”，並使中國人知己之不足，願向西方學習：“當文明幾乎在地球各處迅速發展，消滅愚昧和無知之時……祇有中國仍像過去幾千年間那樣停滯不動。雖然我們與他們交往已久，但他們仍認為天下首尊，把其他民族視為‘蠻夷’……這個月刊的出版就是為了消除中國人的這種高傲心理，讓他們認識到我們的藝術、科學和工藝……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是‘蠻夷’，希望

通過展示事實使中國人相信，他們還有許多東西要學。”<sup>(87)</sup>

鑒於此，《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刊登了大量西方文明知識，涉及歷史、地理、新聞、宗教哲學、自然史、天文、工藝藝術、應用科學、商業貿易、文學及其它各類內容，尤其所刊載的有關地理知識的文章，更是影響巨大。它闢有“地理”專欄，在已見到的三十九期《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除了六期，其餘各期都刊有介紹世界地理知識的文章，共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原刊封面(原大13.7 x 25.8 cm)

地理

葡萄牙國志畧

此福小國在歐羅巴極西之方東連西班牙國西及大西洋也其廣大有一十二萬四千方里烟戶册三百二十一萬口另有列藩屬國居民共計一百五十七萬口其地方嶄巖參差寒暑不甚烈天氣平和十二月春始二月雨下飄風六月穉時之後天氣甚熱十月雪冰有罕雖有陸海之盛然其居民不好勤勞故此土產鮮馬國之葡萄酒珍味載出賣與外國甚多另有多菓于滿口滋味居民皆崇天主教其教師共計二萬九千名昔有修院四百九十間內居隱修男五千七百六十名尼姑五千九百今禁止財產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丁酉八月

入官道光七年每年入國幣銀八百五十萬出銀一千一百萬國家欠銀四千一百萬圓當是年軍營共計五萬丁壯民二萬七千丁巨戰艦四隻中師船十一隻小戰舟十三隻矣漢朝年間其國為羅馬藩屬嗣後蠻族侵國服其大半速回回人類烈心佔西班牙國服葡萄牙地方難為居民極擾攪累百姓也唐朝年間天主教之英雄勇武高興起武藝優嫺奮然攻回回族且再獲所服之國四方凱旋其中俊傑係於南宋高宗十二年攻回回族對豐交鋒大獲全勝弁兵景仰之適在戰場舉之為王自此創立此國也其接位之王甚慈下民憫恤格外元武宗大至元年王開通商百姓取之一百年後國王招賢天監者察究航海之例鼓勵水手

尋新地於是時海山之形勢未明故此西洋諸舟若唐船沿海邊駛倘失水路不可保命也惟葡萄牙商加膽隨指南針遊於海面且冒險焉邂逅逢豐盛之草木叢容之與彼植葡藤結菓繁多不勝也遂漸駛南向只恐愈近赤道愈暑天氣若不辛抵之船人兼熱焦也在亞非哩駕沿海黑族者白面之人甚奇不勝且以金沙易顆珠各項纖芥玩物此等貿易太俾益故葡萄牙商迅速駛南焉當明成化十三年有船主竟至亞非哩駕大地方之南極於是時約翰王號第二者治國屈五爵之權設律例旌獎商梢尋新地開通商向來由陸路駛海中與五印度國通商所以是地方之產物價昂即明弘治八年是國之船初致而到五印度年後絡繹到來結黨隙攻伐國君降服地方以為藩屬國自此以後葡萄牙之權勢於亞細亞之南方日益月增當明正德九年是民與中國開通商中國稱其西洋人也明嘉靖三十二年西洋船趨濠鏡者言舟觸風濤水漬濕貢物願暫借濠鏡海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許之時僅草舍數十間後商人謀利者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西洋人居澳自汪始○惟財帛悖入亦悖而出商賈富到極處民人懶惰不勤勞農務衰也且外國商載各項貨物自賣則葡萄牙國之貿易日少而百姓日窮也況民之為教師者多則離俗世而隱修道也其接位之王甚慈下民憫恤格外元武宗大至元年王開通商萬難各人不篤信天主教必服罪受刑或禁住監牢令罪犯在獄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丁酉八月

萬難各人不篤信天主教必服罪受刑或禁住監牢令罪犯在獄

道光甲午年四月

##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愛漢者纂

道光癸巳年六月

##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愛漢者纂

計三十五篇，主要介紹了東南亞、南亞、歐洲各國，還有南極、埃及、好望角和北美各一篇，世界地理全圖之總論和列國地方總論各一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所傳播的世界地理知識在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誠如業師黃時鑒先生所指出的：“如果說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等耶穌會士在17、18世紀掀起了在華傳播世界地理知識的第一波，那末郭實獵、禱禮哲、慕維廉、俾士等新教傳教士便在19世紀中葉推逐了它的第二波，而第二波則正是從郭實獵在《東西洋考》上連續發表世界地理文章開始的。”第二波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更為深遠，產生了一些全新的世界地理著作，如魏源的《海國圖志》、梁廷柅的《海國四說》和徐繼畲的《瀛環志略》等，“從學術上看，正是這第二波世界地理知識的傳播導致了這些新的地理學成果的出現”<sup>(88)</sup>。此

外，《東西洋考》還以各種形式介紹了歐美政治制度如英國議會、美國國會、西方報刊及郵政系統等方面的知識，並刊載了西方一些著名人物的傳記，如拿破侖、華盛頓等，其中拿破侖為中文傳記中第一次出現的歐洲歷史人物。<sup>(89)</sup>這兩位外國英雄事蹟的介紹，對於當時探求救亡自強的中國志士是一個巨大鼓勵，給長期處於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之下的中國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人起了啟蒙作用。

不僅如此，外國人創辦的這些期刊，對中國報刊業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僅西刊所用的西方先進印刷技術被中國人自辦的報紙所採用，而且西刊在編輯、排版、欄目設置等方面也給中國人自辦的報刊提供了參照。以郭實獵於1833年在廣州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例，該刊為新教傳教士

漸衰或定死罪尚活燒之如此行嚴刑良民逃去及其教師弄權焉○尚未甚窮之時西洋船隨風漂泛到亞墨理駕東南其地方草木稠密茂林猿猴土蠻鮮矣西洋民即獲其廣邦壅開新地且搬移人戶是地之土產殷殷出糖紅木金銀寶玉也真可謂天下蕃毓之地○正興旺之際國王攻擊亞非哩駕北方回回之族衝鋒出兵打仗惟西洋之軍敗散奔竄且王致斃矣萬曆五年西班牙王即侵奪其國六十年之際肆為殘虐西洋人如此受暴虐壓服喟然怨恨願效死雪辱也正躊躇間外國之軍槍奪其屬藩之國及民之權勢衰矣適大清開基創業西洋諸侯鼎力皆叛西班牙國強戰自卸套也國君操權而國家興焉此後國王與英吉利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夏 丁酉八月

民立通商之約凡遇釁隙英國助之○國之君乃同五爵耗費財建殿堂修道院惟乾隆年間宰相豪氣精神爽利挽流俗而臻於善焉革舊例設新法觸目警心及降教師之權焉其軍營操演武藝能足抵當西班牙兵矣嘉慶五年法蘭西民侵葡萄牙國奪取城池強服其民十一年驅逐國王王乃乘機駕船駛到亞墨理駕藩屬國也庶民臨危英吉利將軍對壘交鋒久戰勝負不分畢竟獲勝也而法蘭西民忙走矣六年間戰不勝武不偃仗不停矣道光二年國王返本國攝權然民之甚好自主之理招公會商議政情自立其例令王發誓恒守之惟拘泥之徒不悅搬動是非舞弊作亂捉自主之豪英從重治罪也國王無奈何而避危登英吉利

躬商議妥當敷詔勸民安分且設立條律道光六年王崩其孫公主接位既尚幼年戚代掌理數年之前為滋亂之魁姑且弄權外國咸棄之霸王不失望而與教師有刎頸交如此居民互相攻擊若狼殺豕真可謂屍山血海也但招災攬禍上帝棄絕之其姪再標權執國之例垂愛庶民却國家未安焉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夏 丁酉八月

駝鳥為諸禽之至高自首至脚高庶乎九尺其頸長首小羽如毛罕有身之毛有黑色翼尾白翎蹄光硬如鱗焉此鳥因翼之短不能飛而快走賽駝馬也此駝鳥樂熱曠野巡跑食沙磧礫珠也母生蛋於沙內晝日曬發之夜則覆蛋焉因翎之貴美人狃獵之遇追趕避逃無奈何駝鳥藏首沙內如此欲躲身焉西國之女人用翎戴帽此其標緻不勝矣

豺

豺為貓類其狀像似犬焉脚堅厚眼者瞎矣其毛紅色有黑點身有黑斑爛焉豺行跳走如貓捉小禽獸拖且食之壯饑攀樹待獸

在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種中文雜誌，它已採用分類編纂方法。在其創刊號，即將所刊內容分為序、東西史記和合、地理、新聞；後又增加天文、箴語、市價篇、史記等，復刊後又增加了雜文以及介紹西方科技、商務、政治、文化和生物等的篇幅。這種明顯的採用分類編纂的方式，對以後中國期刊的編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此，我國新聞史專家方漢奇先生曾指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編輯方面每期在卷首都刊有本期內容目錄，清晰醒目，便利讀者閱看。欄目基本穩定，隨着需要的變化略有改動。在稿末編者有時加上編者按語。這些做法，後來中文報刊經常採用，但當時還是第一次。總之，在業務上，《東西洋考》已在相當程度上具有近代報刊的基本特徵了。”<sup>(90)</sup>

總之，傳教士所創期刊開我國近代報業之先河，“教會創刊帶動中國報業的發展，可以說是鐵一般的事實，此亦即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文化作出實質貢獻的一面。”<sup>(91)</sup>可以這樣說，中國近代報刊的創辦、出版機構的建立及近代印刷技術的傳入都與西方傳教士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儘管西方傳教士的目的主要在於傳教，但客觀上，它無異向當時的中國出版業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正是這股新鮮血液，使得中國出版業開始了它的近代化歷程。”<sup>(92)</sup>

### 傳教事業：奠定基礎

1807年馬禮遜到中國時，滿清政府除了堅定執行禁教政策外，還奉行閉關鎖國政策，限制與西方國家往來。當時唯一獲准進入中國的是商人，並且必須是屬於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其他人居留皆屬非法。因此，為能合法居留中國，藉此也可為傳教事業獲得一定的經濟保障，1809年馬禮遜被東印度公司僱傭為翻譯，此後一直到1834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取消，馬禮遜亦因病去世為止。同時，由於馬禮遜是當時為數不多的精通中文的英國人，除英國洋行商務外，中英之間官方和民事往來亦常需馬禮遜出面交涉。1816年英國派阿美士德（Amherst）使團來華，謀求改善中英貿易關係，馬

禮遜曾作為翻譯隨使團前往北京。所以，馬禮遜在中國的許多時光是在處理中英往來文牘和英國廣州洋行的商務中度過的。作為傳教士，他時刻未忘他的傳教職責，正如簡又文所說：“他雖與商界政界有關係，但始終以傳教為目的，未嘗因其它副業而稍變初衷也。”<sup>(93)</sup>海恩波也認為：“從開始到生命結束，馬禮遜從內心和靈魂深處都是一個海外傳教士。他接受東印度公司的任命是因為它能給他提供完成神職的方便和所需資財。”<sup>(94)</sup>——實為的論。

由於滿清政府禁止公開佈道，馬禮遜主要採取文字事工，包括翻譯聖經、用中文翻譯、寫作並刻印、散發一些宗教宣傳品。這是當時“最安全和最可行的工作，也是馬禮遜一生事業的最大成就”<sup>(95)</sup>。從1810年起陸續翻譯、刻印《使徒行傳》外，馬禮遜感到需要有一些用中文著述的簡短而系統的基督教釋義方面的書籍，於是他在1811出版《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1812用中文編寫並出版了《問答淺註耶穌教法》。它以英格蘭教會出版的《教義問答》為藍本，並增加了適合異教徒閱讀的一些問答，還附加了祈禱文以及詩篇和聖詩各兩個短篇。這本書曾被馬禮遜廣泛用於教導中國年輕人，並在馬六甲英華書院試用。據統計，馬禮遜著述的中文著作達十九種，加上英文著作，共計四十種，這還不包括他在各類雜誌、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此外，馬禮遜自費設立兩個印刷所<sup>(96)</sup>，澳門的英格蘭印刷所即是其中之一。他還極力要求英國和美國的基督教會派遣能著述和印刷書籍的傳教士來華。

作為馬禮遜的助手，米憐也認為利用中文出版是把基督教真理傳到中國的一種非常可行的方式。他說：在每種高雅的語言中，出版物對於傳播世俗和宗教知識的益處都是很明顯的。至於用中文出版的書刊，也許要比任何別種文字更能有效地與中文讀者溝通，因為中國能看書的人，其比例遠比人類的其他民族大得多。中國的口語方言很多，而且彼此差異極大，即使鄰省的人不求助書寫，也無法進行任何長短的對話。由於中國的書寫文字在整個中華帝國，甚至大多數朝貢國和幾個鄰國是通用的，利用寫中國字的辦法可以和講任何方言的中國人溝通。尤其是中國現



基督新教第一位中國牧師梁發（1784-1854）

梁發號學善者，別署學善居士，廣東高明人。嘉慶九年（1804）到廣州當雕刻印刷工，1810年接受馬禮遜聘請專事刻印《聖經》中譯本。1815年跟隨米憐往馬尼拉印刷所工作，翌年加入基督教。1818年協助米憐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1824年擔任牧師，繼承馬禮遜在廣州的傳教工作。曾撰寫許多宣傳教義的小冊子，藉廣州府試時向士人散發。洪秀全在廣州曾得其《勸世良言》，對其後創立拜上帝會甚有影響。

在實行閉關政策，對外國人存在着無法克服的嫉妒，基督教牧師不能進入中國用生動的語言進行傳教，用中文著成的書籍卻一般人都能理解，而且可以通行無阻，祇要有人小心翼翼地散發，就可傳入中國全國各地。<sup>(97)</sup>米憐本人有中文著作達到二十一種，其《張遠兩友相論》幾與利瑪竇的《交友論》相媲美；另一位德國傳教士郭實獵的中文著作則達六十一種，是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中中文著述最多的人。<sup>(98)</sup>

在馬禮遜的影響下，繼其之後來華的英美來華新教傳教士，大多致力於著述、出版等。1842年前，新教傳教士在馬六甲、巴達維亞、新加坡等地共出版中文著作一百三十八種，其中有關宗教內容的佔絕大部分，達一百零六種；屬於介紹世界歷

史、地理、政治、經濟方面的著作有三十二種。這些書刊中包涵的知識，對中國近代智識分子啟蒙具有重要意義；它在傳播基督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尤為後來的傳教士所重視，並得到繼承光大。廣學會等重要的基督教出版機構的建立，實以馬禮遜的出版活動為圭臬。

無法公開佈道，馬禮遜就舉行家庭禮拜，把他僱傭的中國助手及傭人作為傳教對象。據馬禮遜的妻子回憶：“幾乎從他在中國居住之初，就努力使他的中國助手和傭人增加對禮拜日之事的關注。”向他們宣揚基督教教義，與他們一起唱聖歌、祈禱詩，這樣的活動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sup>(99)</sup>。米憐曾說：“馬禮遜早期所做的努力，就是把教他語言的那些人的靈魂轉向關心宗教，使之皈依耶穌基督。在安息日，他同傭人們一起讀他帶來的《四福音書合參》。”<sup>(100)</sup>麥都思也說馬禮遜的此類活動“僅限於與他同住的人，以及前來聽他講道的少數幾個鄰居”<sup>(101)</sup>。

馬禮遜的這種家庭禮拜在其七年的努力後終於有了回報。1814年7月16日，蔡亞高由馬禮遜施洗入教成為基督徒，他是中國第一個基督新教信徒。<sup>(102)</sup>蔡亞高兄弟三人，1808年初由容三德介紹與馬禮遜相識，與他的哥哥蔡亞興一起為馬禮遜刻印新約中文譯本。蔡亞高常到馬禮遜家中聽他講耶穌，起初因為語言上的阻隔，蔡亞高不明白馬氏所講教義，後來參與雕印《新約》，逐漸對基督教產生興趣。1812年9月8日，蔡亞高即請求馬禮遜為其洗禮，但馬禮遜以其性情暴戾之故，未予答應。<sup>(103)</sup>蔡亞高並未因此氣餒，每逢禮拜日必步行數里到馬禮遜家中參加禮拜，漸漸養成祈禱的習慣，他寫的信仰志願也頗令馬氏滿意，於是在1814年7月16日為蔡亞高洗禮，這使馬禮遜大受鼓舞。<sup>(104)</sup>他的哥哥蔡亞興、蔡亞三也都信仰福音。<sup>(105)</sup>對此，倫敦會1814年的報告中也有記載：“馬禮遜不被允許公開傳教或進入中國內地，但他向他的僕人和其他一些人講解《聖經》，同他們一起做禱告。一些人已經從他的講道中受益，拋棄了偶像，渴望成為基督徒，其中一人已經給倫敦會財務總司和秘書來信，高度評價了馬禮遜的活動，並渴望從我們這裡得到有關基督信仰的更全面的解釋。”<sup>(106)</sup>



太平天國《天父詩》扉頁（左圖）和內頁（右圖），據說乃洪秀全所作，共集有詩歌五百首。

給倫敦會財務總司和秘書致信者就是梁發。梁發從1810年起就受僱於馬禮遜刻版印刷，他“與馬禮遜先生發生的接觸和他雕刻新約書板時，由書板中所認識的真理都對於他的心靈有着影響”<sup>(107)</sup>。馬禮遜每年8月至翌年3月在廣州為公司服務，夏季則與家人在澳門歡聚，梁發常去澳門聽馬禮遜講道。馬禮遜在1827年9月18日記道：“梁發已與我同住了一個夏季，他曾讀過《聖經》的大部分，且每日前來求我為之講解其不能瞭解之點，退而將所得以筆記之。亞發最長於祈禱，當彼跪下祈禱之際，最能顯出彼之虔誠。彼天性暴躁易怒，而彼之態度又常為彼之國人所不喜。因彼公言他是基督徒，故我家中之非基督徒工人咸譏謗彼為背棄歷代祖宗所信宗教之人，且為賣國奸賊。梁發曾取得保羅致羅馬人書而意譯之，此書對

於我輩外國傳教士甚為有用，因此書提示我儕以適用之字句，且使我儕可自評其觀念之錯誤而改正之。前一二日，梁發及一美國青年與我等共同紀念耶穌受死，在五人之會議中，有三個相隔最遠之國家，有屬於東半球者，有屬於西半球者。”<sup>(108)</sup>

梁發在致倫敦傳教會財務總司的信中，也談到馬禮遜對他的教誨：“愚今在老先生馬禮遜門下，習讀真道，一載有餘，幸得老先生馬禮遜循循善誘，博文約義，頓開茅塞，略知福音真道之義。弟見真理無窮，其境難盡，愈見愈深，欲罷而不能，是以日夕早晚，切求上主施賜聖風之德，為愚靈心，竭盡吾木，或能學習於一二，可以遏慾寡過，正己修身，或以之勸為教人也。”<sup>(109)</sup>梁發於1816年11月3日由米憐施洗，1823年馬禮遜回國休假，將

他封為宣教師，這是第一位中國新教牧師。他熱心傳教，他的妻子、父親都信仰基督，除妻子外，梁發曾為五人洗禮。<sup>(110)</sup>此外，梁發認為著述佈道小冊子散發是傳揚聖道最宜實行的方法。在1823年一年中，梁發與屈亞昂分發的印刷品，單是廣州與廣東各地就達四萬冊，包括一百部全套（五冊）《新約》、五千部《聖書日課初學便用》（五冊）、五千張單頁，一百部《聖書日課》送往廣西、四百部送往沿海地區、四百部往南洋。梁發還注意到分發傳教書刊最好的時機，是廣東學政歲試各府縣士子期間。他們打聽學政的行程跟着巡迴散發，至少到過高州、肇慶、廣州等地。1830年陰曆五月底到六月中旬，學政排考各縣文童，他們也按期到貢院，據說共分發了六百四十二本傳教“小書”；1833年9月，廣州府試期間，士子雲集城內，僅在9月14日當天，梁發就發放小書四百本與《雜聞篇》四百多份。<sup>(111)</sup>梁發自己著述的宗教書籍有《救世錄攝要略解》、《熟學聖理略論》、《真道問答淺解》、《真道尋源》、《祈禱文贊種神》等，其中最著名影響最大的就是《勸世良言》，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和發動太平天國運動就是受到它的影響。這些小冊子均由倫敦會出資印刷。馬禮遜說：“如英國教會不襄助款項以印刷小書，則彼等又怎能達此目的呢？”<sup>(112)</sup>麥靄恩說：“梁（發）先生乃中國第一個改正教宣教士；當全國人反對基督之時，他獨敢自承為基督徒，從這點上，就可以看到他不是一個尋常的基督徒了。”<sup>(113)</sup>

屈亞昂也是馬禮遜皈依的僕人。屈亞昂生於1787年，職業為刻印工匠，曾隨梁發偷渡馬六甲。1816年開始接受米憐的施洗前教育，但米憐最終並未給他施洗。屈亞昂後來經常聽馬禮遜講壇，終在1830年2月由馬禮遜給他施洗，並成為梁發的助手，負責宗教書籍的刻印分發。1831年夏間，屈亞昂從馬儒翰學得石印技術後，由馬禮遜資助，自行石印許多單張雙面印的聖經故事，一面文字，一面圖畫，然後帶往廣州城內及各地散發。1834年他被馬儒翰送往南洋，從事宣道。鴉片戰爭後到達香港，從事傳教直至去世。<sup>(114)</sup>

馬禮遜在華二十五年，經他直接施洗的中國信徒除上述外，還有梁發的兒子梁進德、曾在英華書院任

中文教師的朱先生（Choo Seen-sang），總計祇有十人。<sup>(115)</sup>如果僅就數量而言，馬禮遜的傳教業績確是不足掛齒的。然而，正像簡又文在談及馬禮遜時所說：“他工作之根本性質乃在開創大業，奠定基礎，其價值在質，固不能以區區數量估定之也。”<sup>(116)</sup>確然如此，我們在評價馬禮遜時，不能僅看其施洗的信徒數量，而要看到馬禮遜的工作為以後基督新教在中國傳教事業所奠定的基礎，特別重要的是馬禮遜為後來的傳教士準備了初步的然而大量的中文基督教書籍。麥都思曾這樣說道：“從1810年到1836年，有不少於751,763冊勸世小冊子和書籍從中國的傳教印刷所中分發到各地。這些書中相當數量的圖書都是馬禮遜博士撰寫的。”他還一再表示這個書目所提供的還不是完整的統計數位。<sup>(117)</sup>

馬禮遜在澳門的一系列活動，構成了他在華事業的最重要部分。它不僅給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帶來深遠影響，而且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寫下了濃厚的一筆，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被再造了生機。筆者以為，無論就促進在華傳教事業還是推動中西文化交流上，馬禮遜堪與利瑪竇媲美。因為若無利瑪竇之率先進入中國內地打開門戶，採取正確的“文化適應”傳教策略，那麼就不會出現一度興旺的天主教在華傳教的盛況；同樣，若沒有馬禮遜來華奠定基礎，則不會有米憐、郭實獵、裨治文、衛三畏等英、美、荷傳教士的相繼來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內容也就不會那麼豐富。所以，如果把利瑪竇看作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開創者，那麼，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開拓者當屬馬禮遜，而且由馬禮遜開啟的這次中西文化交流，層次更深，影響更久遠。由此可見，馬禮遜的貢獻不僅僅在宗教上，在文化上亦應作如是觀。

#### 【註】

- (1) 關於基督教新教始傳中國時間，學術界尚存異議。龍基成主張新教傳入中國應以17世紀荷蘭新教傳教士在臺灣土著人中傳佈為始。見氏文〈基督新教在中國的最早傳播——17世紀的荷蘭傳教士與臺灣平埔族〉，載《文史知識》1990年第2期；但大多數學者認為以1807年馬禮遜來華為起始，美國學者保羅·科恩也認為，由於17世紀中葉荷蘭新教徒在臺灣的傳教最後以失敗告終，而主張馬禮遜為新教

- 來華第一人。見費正清主編：《康橋中國晚清史》(上卷)，頁60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 (2) 簡又文著：《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序言、頁9，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年。
- (3) 海恩波著、簡又文譯：《傳教偉人馬禮遜》，頁103，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0年。
- (4) 莊柔玉：《基督教聖經中文譯本權威現象研究》，頁9，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0年。
- (5) 海恩波著、陳翼經譯：《聖經與中華》，頁18，香港，宣道書局，1951年。
- (6) 誠質怡：〈聖經之中文譯本〉，載賈保羅《聖經漢譯論文集》，頁3，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5年；汪維藩：〈聖經譯本在中國〉，載《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1期。
- (7) W. J.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Missions to China*, New York, 1888, p. 36.
- (8)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34, p. 41.
- (9) 中華聖經新譯會：《中文聖經翻譯小史》，頁8，香港，1986年。
- (10) 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頁36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 (11) 陳健夫：《近代中華基督教發展史》，頁27，臺北，海天出版社，1989年。
- (12)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34, pp. 40-41.
- (13) 趙維本：《譯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頁66，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3年。
- (14) 莊柔玉：《基督教聖經中文譯本權威現象研究》，頁10，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0年。
- (15) 陳健夫：《近代中華基督教發展史》，頁27，臺北，海天出版社，1989年。
- (16)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9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7) 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 New York, 1924, p. 123.
- (18)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 London, 1839, p. 353.
- (19) 米憐翻譯的部分是〈申命記〉、〈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記〉、〈歷代記〉、〈以斯帖記〉、〈尼米希記〉、〈約伯記〉等，見賈立言著、馮雪冰譯：《漢文聖經譯本小史》，頁26，上海，廣學會，1932年。
- (20) 許牧世：《經與譯經》，頁131，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6年。
- (21) 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頁125-126、頁597，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
- (22) (23) (英) 湯森著、王振華譯：《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頁67；頁68。
- (24) 趙維本：《譯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頁18，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3年。
- (25)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頁16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 (26)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34, p. 62.
- (27) 海恩波著、陳翼經譯：《聖經與中華》，頁61，香港，宣道書局，1951年。
- (28) 賈立言著、馮雪冰譯：《漢文聖經譯本小史》，頁26，上海，廣學會，1932年。
- (29) 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彙編》，第9冊，頁4-6，臺灣鼎文書局，1973年。
- (30) 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頁599-600，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
- (31) 詳細情況請參閱中華總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頁1035-104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 (32) E. A. Morrison, *op. cit.*, Vol. II, p. 355.
- (33)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9-43.
- (34) E. A. Morrison, *op. cit.*, Vol. II, p. 48.
- (35)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頁205-206。
- (36) S. W. Barnett and J. K.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1.
- (37) 李楚材編：《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資料——教會教育》，頁43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
- (38) S. W. Barnett and J. K.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p. 5.
- (39) E. A. Morrison, *op. cit.*, Vol. I, p. 548.
- (40)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pp. 130-131.
- (41) Helen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ol*,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p. 26.
- (42) (43) E. A. Morrison, *op. cit.*, Vol. II, p. 387; pp. 61-62.
- (44)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頁106。
- (45) 麥露恩、胡簪雲譯：〈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2期，頁165-166。
- (46)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頁124。
- (47)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p. 375.
- (48)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pp. 375-381；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頁3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49) 費正清：《康橋中國晚清史》(上卷)，頁6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 (50) 李楚材：《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資料——教會教育》，頁5，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
- (51) 李楚材：《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資料——教會教育》，頁5-6。
- (52) 余日章：〈基督教會之高等教育之特色〉，載《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14年第1期，頁75-76，轉引自李楚材前揭書，頁135-136。
- (53) 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冊。
- (54) 《史料旬刊》第九期，“乾隆二十四年喇嘛通商業”，頁307-310頁，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年。

- (55) (英)喬治·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幹隆紀實》，頁317，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
- (56) 李志剛：〈馬禮遜對十九世紀英語世界漢學家之貢獻與影響〉，《〈道風〉漢語神學學刊》第三期（1995年秋季號），頁87-105。
- (57) E. A. Morrison, *op. cit.*, Vol. I, pp. 96-97.
- (58) 關於《華英字典》各卷頁數及總頁數，各家說法頗異：庫壽齡1917年出版《中國百科全書》認為：“第一部分第一卷XV III+ 930頁，第二卷884頁，第三卷908頁；第二部分第一卷XX +1090頁，第二卷VI+178,305頁，第三部分480頁”；葉再生先生則認為：“第一部分第一卷為2+18+930頁，第二卷12+8+1072頁，第三卷908頁；第二部分第一卷為20+1090頁，第二卷5+350頁；第三部分5+480頁。”參見葉再生〈概論馬禮遜的中國語文字典：中國最早一家現代化出版社和中國近代出版史分期問題〉，《出版史研究》第一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年版，頁16；汪家塔認為：第一部分第一卷為954頁，第二卷884頁，第三卷910頁；第二部分第一卷1110頁，第二卷488頁；第三部分490頁，通共4836頁。見《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頁271-272。
- (59) 汪家塔：〈鳥瞰馬禮遜字典〉，載《出版史研究》1997年第5期。
- (60) (61)《五車韻府》，卷1，頁5。
- (62) 陳力衛：〈早期的英華字典與日本的洋學〉，載陳少峰主編《原學》第一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
- (63)《英漢字典》，頁465-466。
- (64) 譚樹林：〈《華英字典》與中西文化交流〉，《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1期。
- (65) (66) (英)湯森著、王振華譯：《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頁111，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 (67) 容閔：《西學東漸記》，頁8。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95輯，文海出版社。
- (68) 陳力衛：〈早期的英華字典與日本的洋學〉，載陳少峰主編《原學》第一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
- (69) E. A. Morrison, *op. cit.*, Vol. II, pp. 412-413.
- (70) 岩其直己：《柴田昌吉傳》，昭和十年私家版，轉引自陳力衛前引文。
- (71) 古賀十二部：《德川時代長崎的英語研究》，昭和十年私家版，轉引自陳力衛前引文。
- (72) 陳力衛：〈早期的英華字典與日本的洋學〉，載陳少峰主編《原學》第1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
- (73) 王洪祥主編：《中國新聞史》（古近代部分），頁68，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
- (74) (新)王懷鼎：《新加坡華文報刊史論集》，頁9，新加坡新報社，1987年。
- (7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 p. 235.
- (76)《察世俗》序言，頁2。
- (77) Robert Philip, *The Life and Opinion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London, 1839, pp. 196-197.
- (78)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1820, p. 277.
- (79) 卓南生：〈新教在馬六甲的傳教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誕生〉，《新聞研究資料》第56輯。
- (80)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 p. 283.
- (81)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Taipei, 1967, pp. 16-17.
- (82)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1929, p. 223.
- (83) William Milne *op. cit.*, p. 271.
- (84)《察世俗》卷二，十月號。
- (85) Robert Philip, *The Life and Opinion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London, 1839, p. 196.
- (86)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 49.
- (87) S. W. Barnett and J. K.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p. 96.
- (88) 黃時鑒：《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導言，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7年。
- (89) 黃時鑒：〈《譜姓：拿破戾翁》序說〉，樓鈞信等《中法關係史論》，頁103，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
- (90) 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頁26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
- (91)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集》，頁5，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
- (92) 蕭東發主編：《中國編輯出版史》，頁383，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
- (93) 簡又文：《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頁5，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年。
- (94) 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 p. 135.
- (95)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頁38，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88年。
- (96) E. A. Morrison, *op. cit.*, Vol. II, p. 501.
- (97)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1820, pp. 153-154.
- (98)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頁185-198。
- (99) E. A. Morrison, *op. cit.*, Vol. I, p. 197.
- (100) E. A. Morrison, *op. cit.*, Vol. I, p. 300.
- (101) Walter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1838, p. 265.
- (102) 麥霽恩：《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胡簪雲譯，頁148。
- (103) 麥霽恩：《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頁148。
- (104)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II, p. 327.
- (105)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麥霽恩：《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頁149；頁149；頁162-163；頁163-164；頁165；頁143。
- (106) E. A. Morrison, *op. cit.*, Vol. I, p. 392.
- (110)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頁270。
- (111) (114)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出版印刷》，頁27-29；頁27-29。
- (115)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1929, p. 213.
- (116) 簡又文：《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頁5頁，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年。
- (117) Walter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1838, p. 592.